

从诏令看北宋时期君主的“畏天”之德

徐 红*

〔摘要〕 由于北宋特殊的政治环境,“畏天”成为君德的重要内容,其核心意义是敬慎。“畏天”在诏令中的使用语境,包括新皇即位、发生灾异、群臣上尊号三种,一方面表现出对天的敬畏之意,一方面表达了建立在天命基础上的皇位合法性诉求。“畏天”也是北宋士大夫对君主德行的期望。他们通过上书、撰写专门论证文章的形式,阐发“畏天”是约束君主的手段之一,以此说明君主的“畏天”之德不仅仅只是道德领域的事,还具备了政治上的重要作用。既能表明其为君之合法性,又能教化百姓,有利于形成修德、立身、听命的社会之风,稳定其统治。

〔关键词〕 北宋;畏天;敬慎;君德

“畏天”即寅畏天威,是中国古代专制时代君德的内容之一。关于君德,儒学有较为明确的理论阐释。孔子有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①人君若是能够做到为政以德,则天下人共尊之。《尚书》亦言:“德惟治,否德乱。”^②将天下之治乱安危系于帝王是否有德,是否实行德政。君德的内容比较宽泛,既包括寅畏、宽恕、仁厚、勤俭、谦逊等君主的私德,也有爱民、公正、勤政、任贤、从谏等公德。对于君主个人来说,要做到君德的每个方面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君德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就北宋而言,自创建伊始,就有君主统治的合法性、内忧外患的政治形势以及大一统疆域的无法实现等问题困扰着赵宋统治者。为此,无论是君主本人,还是心忧天下的士大夫们,皆将“畏天”视作君德的重要内容。

一、“畏天”的释义及内涵

最能清楚表明北宋皇帝“畏天”之心态的是帝统门诏令。《宋大诏令集·帝统》包括北宋太祖至

* 历史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411201,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道德与秩序——宋代诏令文本的历史学解读”(12YJAZH169)的阶段性成果。

① 杨伯峻译注:《论语·为政篇第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页。

② 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卷八《太甲下第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17页。

徽宗凡八帝之即位、诞节、改元、名讳、尊号批答、尊号册、尊号赦、违豫康复、内禅、遗制、谥议、谥册、哀册等名目的诏令约133条。查检这些诏令,笔者发现以“畏”为中心的同义词组有“寅(夤)畏”、“抑畏”、“兢畏”三个,其他与“畏”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表述方式有“涉大川”、“怵惕以懼”、“若履渊水,未知攸济”、“馭朽”、“兢慎”、“兢兢业业”、“惕惕居怀,兢兢在念”、“畏天之威,慄慄危懼”、“愧惕”、“寅恭”、“小心翼翼”等,而且,几乎在每一条诏令中,均有这一类“畏”的意义表达。

“寅畏”语出《尚书》:“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宁。”^①意为恭敬,戒懼,小心谨慎,其对象为天。“抑畏”亦源自《尚书》,其言:“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②有克制自己、敬畏天命之意。“兢畏”的“兢”指戒慎,许慎言其亦含“敬”之意^③。从这三个词组的本义看,其共同点是皆以“敬”为中心,由此使得作为这些词组中心词的“畏”,肯定也不仅仅是要表达畏惧、担心之意,更重要的是恭敬、敬慎。也就是说,贵为“予一人”的皇帝,和普通百姓一样,对天也是敬畏有加,这样一方面能获得上天的庇佑,达到阴阳调和,风调雨顺,物资丰富,政通人和;另一方面则表明君主敬畏上天之威,时时保有怵惕之心。

“畏天”在诏令中的使用语境,亦提示我们其内涵是以“敬天”为中心的。北宋《帝统门》诏令使用“畏天”之类的语词主要包括三种情况。

其一是新皇帝即位之时。此类诏令开篇往往皆言新皇是接受上天的眷顾而得以承继大统,即所谓“奉天承运”。紧接着追述先皇的功绩和勤政,“无一日不举皇纲,无一事不亲圣览。宵衣旰食,焦思劳神。禹迹混同,方致太平之运;尧心不倦,俄兴弗豫之灾”,然后先皇“弃大宝以上仙,付冲人之神器”,将皇位传给新皇。新皇接受了上天与先皇的重托,但心中惴惴然,不知如何担负起治国之重任,“若涉大川,罔知涯涘,黽勉负荷,兢畏交并”^④,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敬畏天命、审慎戒惧、不敢有丝毫懈怠的心情。

对于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政权来说,“奉天承运”是任何一位帝王皇位合法性的前提和重要保证,即使几乎所有的开国皇帝皆凭借军事实力夺取政权,但其身份的合法性却还是不能仅仅是建立在武力的基础上。所以,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中,“天”的形象虽然模糊不清,但却是有意志、有感情的人格神,能够主宰世间万物,是人间一切事物存在的合法性来源,其中就包括皇帝身份的合法性,这就是“奉天承运”。这种观念在汉代董仲舒的思想中有着非常清晰的表述,其云:“天若不予是家者,是家安得立为天子?立为天子者,天予是家。天予是家者,天使是家。天使是家者,是天之所予也,天之所使也。”^⑤天子的身份、地位完全是上天给予的,质言之,皇位之归属必须得到上天的认可,否则不具有合法性。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皇帝虽然贵为天下之主,也必须迎合这种文化传统,即使有疑天之心,也不能违反文化传统中的这种合法性信仰模式。实际上,对于皇帝来说,他也需要利用文化传统中为百姓所认同的合法性信仰,利用天神无所不至的力量,不断强化和重构自身至高无上的权威身份,以利于他的统治。降及北宋,诸位皇帝均很清楚地意识到,天下臣民百姓都认同这种来自于奉天承运的皇位合法性传统,都相信皇帝应该是生身有命的,因此要永久拥有家天下的地位,就必须畏天。

其二,发生灾异之时。淳化元年(990),宋太宗因“爰念去秋,颇闻愆亢,虑将成于灾沴,固深轸于忧劳”,于是祈雨于名山大川,又撤乐减膳,希望以自省来减除灾异,最后“精诚上通,灵应犹响。雨如

①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卷一五《无逸第十七》,第630页。据孔安国传,言中宗“严格恭敬,畏天命,用法度”,“寅”有“恭敬”之意,后来与“畏”合用,很明显包含着恭敬之意。

②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卷一五《无逸第十七》,第634页。

③许慎:《说文解字·兄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20页。

④不著撰人:《宋大诏令集》卷一《真宗即位赦天下制》,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页。

⑤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五《郊祀第六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5—516页。

膏而润物,雪盈尺以呈祥”,由此得出结论云:“圣人立言,既以慈俭为宝;王者之道,必先兢慎为心。”^①将“兢慎”即寅畏之心看作是王者之道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实则在这之前的端拱二年(989),不仅有影响农业生产的旱灾,还发生了更让君主担忧的异常天象,“有彗出东井、积水西,青白色,光芒渐长,晨见东北,旬日;夕见西北,历右摄提,凡三十日至亢没”,太宗由此谓宰相言:“长星示变,盖天所以警人君之失,固宜恐惧修省。晋孝武反举酒劝之,如此狂惑,不亡何待。今岂非时政有阙,物情雍遏乎!百姓何罪,责在朕躬,敢不兢畏贬损,以答天谴。”^②明确表示要以自身的“兢畏贬损”应答天谴。后来果然天降雨雪,解除了旱灾,所以才有第二年改元淳化的应天之举。再如宋仁宗皇祐六年(1054)三月,太史言四月将有日食,于是仁宗下诏改元至和,“减死罪一等,流以下释之”,且“易服,避正殿,减常膳”^③。与太宗一样,仁宗在改元诏令中亦表现出“畏天”之心,“畏天之威,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谷,兹用惕于夙宵”,“恐惧乎未睹,抑畏于未然,庶竭夤恭,或致消复”^④。

在古代中国,灾异常常被视为天谴的重要表现,正所谓“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⑤,董仲舒将灾与异分别看待,认为灾显示了天对君主某些不当行为的警示,如若君主未能听从,则会发生“异”,即异常天象,以示天之威严。更重要的是,无论灾还是异,其发生的原因皆在于国家之失,也就是君主为政之失。因此,灾异谴告论的核心是皇帝作为天之子,奉行天之旨意治理天下,处理人间事务,如果皇帝的治理有失误之处,天会通过灾异的方式进行警告,皇帝看到这些灾异后,要及时反省自身的行为,加以改正,这样灾异就会自然消失,甚至变为祥瑞了。显然,这一理论是导致君主产生“畏天”之心的最重要的原因,表现出天对君主逾矩行为的约束力。

其三,群臣上尊号之时。尊号是臣属尊崇君主而为之所上的称号,大兴于唐代,宋因袭之。如宋太宗曾分别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和太平兴国六年(981),两次接受群臣所上尊号,“应运统天圣明文武皇帝”和“应运统天睿文英武大圣至明广孝皇帝”^⑥,但是端拱二年接连发生的旱灾和彗星等灾异现象令太宗惊惧不已,于是在十二月降下《省尊号诏》,言及自己的惊惧心理,“上夤畏于昊穹,下忧劳于兆庶。万几之重,兢兢敢怠于宵衣;四海之尊,慄慄宁忘于馭朽”,再加太宗也认识到,“居尊之号,近代方行,固非轩昊之令猷,且异唐虞之旧典”,所以诏令将之前所加的尊号悉数省去,只称皇帝^⑦。最突出的是宋仁宗,《宋大诏令集》中所收关于仁宗不允或允上尊号的诏令凡九条,几乎每一条均有“畏天”之类的意义表达,典型者如明道二年(1033)省尊号求言的诏令,仁宗即位之后,“何尝不夙宵兢畏,旰食忧勤”,虽然崇俭、省兵、薄赋,但仍然不能免除旱、蝗、饥之类的灾异,“岂朕德之不逮,将天时之使然?须自戒灾,敢忘罪己,旦申不寐,畏上之威”,于是减省尊号字,诏求极言朝政之阙失^⑧。

尊号一般皆为美字,是群臣对皇帝的溢美之辞,上尊号的原因,要么就是皇帝功德卓著,如有肇始之功,或者统一边境,实现了一统天下;要么就是创造了政通人和、社会安宁的太平盛世。具有如此突出功德的皇帝,本就不多,因此唐以前上皇帝尊号的现象并不常见,唐高宗之后,尊号开始泛滥,并渐成制度。宋人有言:“古天子之称,曰皇,曰帝,曰王,盖称其德也。秦不顾德之所称,但自务尊

① 不著撰人:《宋大诏令集》卷二《改淳化元年降京畿流罪以下德音》,第5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端拱二年七月戊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82页。

③ 脱脱等:《宋史》卷一二《仁宗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6页。

④ 不著撰人:《宋大诏令集》卷二《日食正阳改皇祐六年为至和元年德音》,第8页。

⑤ 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八《必仁且智第三十》,第318页。

⑥ 脱脱等:《宋史》卷四《太宗一》,第59、66页。

⑦ 不著撰人:《宋大诏令集》卷三《省尊号诏》,第11页。

⑧ 不著撰人:《宋大诏令集》卷四《去尊号中睿圣文武字求言诏》,第15页。

极,故称皇帝,然亦未有尊号也。至汉哀帝,始有圣刘太平之号,此岂可为法乎?高祖、太宗,各有功德,俱无尊号,高宗徇武后之意,始称天皇。中宗从韦庶人之欲,乃号应天。二宗并为妇人所制,纲纪号令不由于己,其行事纷乱,果合天理乎?而称曰天皇,号曰应天,是妄自尊大,但取千万世罪与笑耳。明皇以贤继位,祖宗善恶之事,闻见固熟,何故忘高祖、太宗之实德,袭高宗、中宗之虚名?盖臣下谄谀,不守经义,逢君之过而然也。”^①看来皇帝尊号往往名不副实,更多的是臣属的谄谀之举,北宋君主对此应该也有所认识,故而才会有“褒崇太过,中心愧惕”^②之语。如若探究其背后之深意,似与畏天又有着必然的联系。正是因为有畏天之心,北宋皇帝常常会将臻嘉靖、致小康的功劳归之于天助,对于他们来说,若轻易应允加尊号,则有冒天之功的嫌疑,所以不敢妄自尊大,即使加尊号,也要臣下一而再、再而三地陈请。

更进一步看,在北宋时期,朝廷最重要的下行公文——诏令中反复出现君主寅畏天威的说辞,不仅仅是一派虚言或者格式化的套语。细究这些话语,我们可以看到,其目的并不只是对天的敬畏,更重要的是隐含在畏天话语背后的政治期望,即建立在天命基础上的皇位合法性诉求。

二、士大夫对“畏天”的认识

北宋诏令中所透露出来的寅畏天威之意,与其说是皇帝心理的写照,毋宁说是士大夫对君主德行的期望。作为代王言者,这些政治精英们在宋初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首先以帝王诏令的形式,对宋代君主提出了“畏天”的要求。

赵宋建立之初,五代政权更迭频繁、社会秩序混乱的消极影响仍然存在,宋太祖、宋太宗实行了一系列措施稳定统治,如削夺武将兵权以加强中央集权,南下北进以一统天下,复兴儒学以整合社会等等,其中,与本文所论有直接关联者是赵宋统治者崇奖儒学的举动,具体包括任用和优礼儒学士大夫、恢复儒学所提倡的礼制、建立经筵制度为君主讲解儒学经典等。而儒学经典中就涉及畏天之类的意义表达,孔子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③南朝梁人皇侃对“畏天命”作出如下解释:“天命谓:作善,降百祥,作不善,降百殃。从吉逆凶,是天之命。故君子畏之,不敢逆之也。”^④《诗经·我将》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⑤《我将》是周武王出征伐纣前祭祀天帝和先王的歌诗,其中就有寅畏天威、祈求天帝保佑的内容。还有前揭《尚书》中“寅畏”、“抑畏”的含义。宋代儒学士大夫们一直宣扬回向三代,因此这些植根于三代的儒学经典所提倡的寅畏天命思想对他们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过,对于五代时期儒学的衰微和士人地位的低下,宋初士大夫还心有余悸,所以先只是以诏令的形式,借帝王之口,试探性地提出寅畏天命的要求。宋初君主并未对此有所异议,甚至还灾异发生之时沿用了这一解释,如前揭端拱二年六月有彗星出现,宋太宗除了采取避正殿、减常膳的罪己措施外,还特别提出要畏天之威,以自身的“兢畏贬损”来应答天谴。帝王的态度无疑极大鼓励了宋代士大夫,使他们更进一步复兴了将寅畏天命作为君主德行之一的思想。

据现有文献,朝中大臣直接上书要求皇帝寅畏天命以修政事,是到真宗朝才开始显现出来的,到仁宗朝臻于鼎盛。

^①孙甫:《唐史论断》卷中《开元神武皇帝尊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不著撰人:《宋大诏令集》卷三《群臣上法天崇道上圣至仁皇帝号不允批答》,第12页。

^③杨伯峻:《论语译注·季氏篇第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74页。

^④何晏集解,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卷八《论语季氏第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褚斌杰注:《诗经全注·周颂·我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405页。

真宗即位以后,灾异现象频繁,如咸平元年(998)二月彗星出,真宗“诏求直言,避殿减膳”,紧接着又是旱灾及其由此而导致的饥荒,真宗于咸平二年(999)闰三月“诏天下系囚非十恶、枉法及已杀人者,死以下减一等”,并再一次求直言^①。于是时任京西转运副使的朱台符有《上真宗应诏论彗星旱灾》^②,上书开篇,即赞颂求直言之行为“乃陛下祗畏上穹,忧勤庶政,惧一物之失所,俾下情之尽达,广视远听,求治深切之旨也”,然后利用儒学天人合一的理论,证明灾异与人事失和之间的密切关系,“臣闻皇天无亲,王者无私,上下合符,有如影响。若王政缺于下,则天谴见于上,自然之理也”,随之从儒学政治功利性的角度出发,对灾变发生的原因进行解释,“切惟陛下受先帝之顾命,膺兆民之乐推,大孝彰闻,小心畏谨,动遵礼法,不愆旧章。所宜得天,必获嘉应。而践祚以来,二年之内,彗星一见,时雨再愆者,岂非凶丑未尽服,政令未尽顺,天所以示兹警戒也?夫灾变之来,必以类应。故彗星见者,兵之象也。时雨愆者,泽未流也”,之后再对致变的原因进行具体分析,指出两个方面的主要原因,一是军事上的内忧外患,如北部、西北部的边患始终未能解决,内又有荆蛮的叛乱,而饥民也很容易聚啸成寇;二是从经济上来看,虽然真宗即位时曾大赦天下,但朝廷与民争利,致使百姓未能得到实惠,影响了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最后,朱台符用大量的篇幅,着重提出消弭灾异的对策,观其实,均为针对时弊的政策举措。仔细研读上书全文,可以看到,虽然朱台符的论述皆围绕君主畏天这一中心,而实际上是在敷陈一种政治理想,即将灾异作为人间政治得失的镜子,借此来约束帝王行为、审视人间政治得失。这可以说是北宋士大夫上书言灾异的一般特征,不独朱台符一人如此。更重要的是,畏天之类的言辞是言远而指近,其用意在于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加之由于对灾异之因认识的不确定性,在世事变化、政见不一的情况下,士大夫往往借题发挥,显示出对朝廷政治的极度关注以及对国富兵强的热切期待。同时,对于北宋士大夫来说,君主因灾异求直言还是他们利用天命传统,充分发表自己政治主张、谏诤君主的良好契机,也是他们积极参政的重要机会,因此,士大夫的上书虽从寅畏天威入手,最终却皆归于政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进入仁宗朝,借寅畏天威议论政治的上书就一直持续不断。天圣六年(1028),时任右司谏刘随在《上仁宗论星变》^③中言:“臣闻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上自帝王,降及辅相,宰制万物,感应天文。是以政教紊于下,则躔次变于上。自古圣帝明王,兢兢业业,不敢私纵者,畏天命也。若政有失而不改,天垂戒而不惧者,危亡之道也。”引经据典以论证自己的观点,是古代文人常用的写法,刘随以阐发《周易》“天垂象,见吉凶”^④的议论开篇,说明上天是通过天象的变化向人间传达吉凶的信息,如若不敬畏天命,时政有失而不改,则会显现危亡之道。其后他的论述开始转向现实政治,涉及封嗣王、慎选大臣、用君子、斥小人等行政事务,显示出北宋士大夫志在当代的参政议政热情。

庆历四年(1044),参知政事范仲淹有《上仁宗论灾异后合行四事》^⑤,其言:“臣近日屡闻德音,以灾异数见,畏天罪己。此实圣帝明王至仁之体也,天下幸甚。……臣观自古国家,皆有灾异。但盛德善政及于天下,人不敢怨叛,则虽有灾异而无祸变也。如其德衰政暴,兆民怨叛,故灾异之出,多成祸变也。陛下今既畏天戒,上忧宗社,下忧生灵,固已得尧、汤之心矣。如更行尧、汤之事,使天下受赐,其有灾异,适足增陛下之盛德。”然后范仲淹请求仁宗采取以下措施,以利于天下百姓,一是审察地方官员,激劝善政;二是审察刑狱,无至民有冤狱;三是审察常平仓,发生灾异时及时安抚、救恤百姓;四是变革茶盐之法,毋与民争利。范仲淹的上书恰发生在庆历新政之时,与新政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

①脱脱等:《宋史》卷六《真宗一》,第107、108页。

②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三七《灾异一·上真宗应诏论彗星旱灾(朱台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66—369页。

③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三七《灾异一·上仁宗论星变(刘随)》,第371—372页。

④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等正义:《周易正义》卷七《系辞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59页。

⑤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三九《灾异三·上仁宗论灾异后合行四事(范仲淹)》,第397—398页。

改革措施十分吻合,表现了他希望朝廷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的政治理想。范仲淹的议论以称颂仁宗畏天罪己为外壳,以君主有盛德善政可弭灾免祸为引子,对时政阙失提出严厉批评,充分体现了其“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

类似这样借寅畏天命上书言事的奏议在《宋朝诸臣奏议》、《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及宋人文集等史籍中收录众多,其议论方式基本一致,首先论述君主必须畏天,要有寅畏之心,然后从天人合一的理论出发,以天象引出人事,认为君主只有在人事上有所作为,才能消弭灾异。其奏议中所用与天命有关的中心词也基本趋同,如“寅畏之心”、“寅畏天命”、“畏惧天戒”、“祇畏奉天”、“畏天之威”、“寅畏祇惧”、“严恭寅畏”等等,士大夫屡次提到君主的畏天,这是关于君德的描写,更证实了北宋士大夫忧患天下的用世之心。从时间上看,此类奏议大盛于仁宗朝,后又延及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时期,非常清楚地表明士大夫对于君主是否畏天一事,尤其抱着很深的忧虑,而富弼的一句话更是言简意赅地道出了他们担忧君主是否畏天的真实原因。神宗时期,曾有大臣对皇帝言“灾异皆天数,非人事得失所致”,富弼听闻之后,大发感慨说:“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①如实反映了君主不畏天的政治后果。

不仅如此,北宋时期还有士大夫撰写了专门议论畏天的政论文章,以证明寅畏天威之必要,其中最具代表性者有李觏、刘敞、欧阳修三人。

李觏的畏天理论集中表述于其《天谕》^②一文中。文章开宗明义即断言“畏天者昌,习天者亡”,这是全文的主旨,然后解释为什么会这样,“明主思之,以为在德,德修而灾异消,然后愈知天之明而德之益也。暗主思之,以为在数,故任数而不修德,德不修而祸未至,然后愈知天无心而数有定也。惟天之仁又出灾异,以申敕之,彼必曰:前既无害,此奚为哉,亦数而已矣。灾异愈多,不惧愈甚耳”。面对灾异,明主和暗主表现出相反的态度和做法,明主因畏天而修德,暗主则因归之于数而渐渐习惯了灾异的发生,反而愈益不畏天。篇末则云:“然而上帝之怒不足独当,下延众庶,上累庙社,甚可痛也。”这与篇首所论主旨密相呼应,说明习天者亡的原因是上帝之怒会下及百姓,上危朝廷社稷,以非常直接的方式指出君主不畏天的严重后果。

欧阳修专门论畏天的文章是《畏天者保其国赋》^③,原文标题下有小题“祇畏天道,能守其国”可为标题之注引,同时也是全文的主题,此处之“天道”指上天借以谴告人间君主的天象,具体说来,既可以是日食、彗星等天文现象,也包括水、旱等各种自然灾害。欧阳修云:“圣人以凝命恭默,膺图肃祇。爰务畏天之义,但彰保国之规。”将畏天与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接着又进一步申明:“惟帝难之,翼翼固欽于乾道;为人上者,兢兢慎守于邦基。用能御宝位而惟永,隆昌运以咸熙者也。”为人君者,只有尊天、敬天,才能永保皇位,国运长久。其后更论述以畏天为中心的君主之德对于国祚持久的重要作用,“……且曰天惟简在,诚由乎不敢荒宁,国乃治平,是宜乎克自抑畏。惠此方国,欽若昊天。实克遵于慄慄,示无爽于乾乾。……岂不以天者本降鉴而是显,国者在缉绥而以兴。畏乎天,表降鉴之甚迓;保乎国,示缉绥而可凭。……是故惧无灾以为怀,见楚庄之勿伐;不敢康而在念,识周成之有能。夫如是,则垂拱是图,持盈可久。不遑启处兮,以圆灵之是奉;无敢暇豫兮,以中区而自守。……不然,又安得惟寅谨尔,匪懈昭其?盖足惮于覆焘,必克固于蕃维。《周诗》垂陟降之文,亦足畏也;洊雷著修省之说,于时保之。至哉,阐释圣猷,铺昭皇极,眷懋悚以为本,在抚绥而作式。有以见惟天为大,而君则之,故定于万国。”

深究欧阳修这段话,其言外之意更值得关注:第一,畏天不是目的,只是一种约束君主的手段,其

①朱熹:《宋名臣言行录》后集卷二《富弼韩国文忠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李觏:《盱江集》卷二《天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第三册)卷五九《畏天者保其国赋》,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854—855页。

目的是为了保国;第二,欧阳修活动的年代已是赵宋建国六十余年之后,边患不急,社会安定,处处呈现出繁荣昌盛之迹,这时最易出现骄奢豪华之风,于是欧阳修提醒君主,欲永保邦家,则应远离享乐,时刻有抑畏和忧患天下之心。这是北宋士大夫极力劝导君主成为圣贤之君的重要内容,而士大夫自身也秉承着这样的使命,期望能够实现他们“天下治”的政治理想。

刘敞亦撰有内容类似的《畏天命论》^①一文。全文开篇首先引《论语》论君子三畏中的“畏天命”之言,说明天命可畏而不可知,并认为天命有“害于民谓之孽,变于常谓之异,动于气谓之沴,发于色谓之眚,逆于类谓之祥,杂于俗谓之妖,著于天谓之象。是故有以兴,有以亡,有以败,有以成。惟圣人然后能见之、识之,识而名之”,即只有圣人能知天命,非圣人则不能知之,“故古之君子务畏天命,而不务知天命也”。更重要的是,“古之君子,其畏天命也,闻一异则悚然惧,见一祥则悚然惧,未知是之为善欤,为恶欤。悚然惧而已者,吾知畏而止矣,是故其守也约,其行也慤”,因畏天命而言行约束、谨慎。文章最后以成汤为例,“汤之时,八年七旱,汤亲之南郊而祷焉,曰政不一欤?民失职欤?宫室营欤?女谒盛欤?苞苴行欤?谗夫昌欤?由是观之,汤且不知也”,证明“故善畏天者,莫如成汤,为国家若,成汤可也”。

刘敞此文虽未明言帝王畏天命,实际上就是针对帝王而言的。一方面提醒君主,某些妄言天命之人并非圣人,这些人强求知天命,必借天命诽谤政敌,于国无益;另一方面,北宋时期将成汤看作如尧舜禹般的太古明君,成汤尚且不知天命,何况后世帝王?但成汤因灾异而亲赴南郊祭天、问天时政阙失的做法却值得后世帝王效法,刘敞着意表达的主题即是此事透露出的帝王畏天之意。

李觏、欧阳修、刘敞皆活跃于仁宗时期。经过宋初六七十年重文意识的发展,读书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因此仁宗朝的不少士大夫志在当世的热情空前高涨,他们俨然以帝师自居,期望辅佐帝王开创万代千秋之伟业,于是开始明确提出对君主德行的要求,其中就包括寅畏天威这一条目。以上述三人为例,尽管他们的政治地位有高下之别,但平时都有着或深或浅的交往,如他们皆为当时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欧阳修、刘敞自不必多言,李觏也是东南地区学为古文之魁杰,《欧阳修全集》中还收有欧阳修与刘敞、李觏的书信往来^②。文学主张的行合趋同,日常生活的声气相通,很自然导致了他们政治思想上的不谋而合。

实际上,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一些天文灾异现象不再神秘莫测,如日食之类,北宋时期已能对其给予较为正确的解释,甚至还能对日食的起止时间进行较精确的预测,因此,对于日食这一天文现象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如神宗熙宁元年(1068)正月一日日食,群臣拜表称:“天人之交,虽灾祥之宜戒;日月之会,亦盈缩之有常。”^③把日食看作自然界的正常现象。但是类似日食这样的灾异现象所具有的与人间事务相关联的象征意义是十分重要的,对此苏辙就有着清醒的认识。元祐五年,苏辙因旱灾上书言及当时执政的太皇太后虽诚心祈雨,放粮救灾,但却未能采取避殿、减膳、求直言的罪己措施,因此“臣恐九重之秘,忧惧之实,民莫得知。徒见陛下晏然坐朝,临御大众。民愚无知,或谓陛下不畏天灾,不恤民瘼。人心一疑,天意弗顺,以此救旱,所损大矣。臣愚伏愿陛下举行祖宗故事,明诏有司,罢朔会,避正殿,损常膳,令百官吏民皆得上封事,指陈时政阙失。如此施行,虽未得雨,而人知陛下寅畏天戒,不吝改过。群情悦伏,神亦将助,以此救旱,非小补也”^④。苏辙这段话中体现出来的寅畏天威之实际意义昭然若揭,就是要通过君主身体力行作出的畏天罪己姿态,一方面警醒君

^①刘敞:《公是集》卷三九《畏天命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第六册)卷一四八《与刘侍读二十七通》,第2418—2430页;卷一五〇《与李贤良一通》,第2468页。

^③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瑞异二之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618页。

^④苏辙:《栾城集》卷四二《为早乞罢五月朔朝会劄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43页。

主自身,不能毫无顾忌,为所欲为,另一方面使百姓知晓君主畏天悯民,即使未能消弭灾害,亦能得到百姓的认可。

在士大夫集团的影响下,北宋君主基本上接受了畏天的观念,将灾异看作天神对君主本人的警告,君主应该深刻反省自己是否有失德行为,如生活是否节俭,是否摒弃奢靡之风,是否行善政施惠于民,后宫是否清净,政治是否清明,刑罚是否适中,是否用贤人远小人,赋敛是否繁重,大权是否旁落,是否听从谏诤,等等。君主内圣之私德与利国、利民的公德就这样通过“畏天”这一环节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君主的良好道德不仅仅只是道德领域的事,还具备了政治上的重要作用。它可以成为一种感召力,既能表明其为君之合法性,又能教化百姓,有利于形成修德、立身、听命的社会之风,稳定其统治。

(责任编辑:王永贵)

A Study on *Weitian* of Emperor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Zhaoling*

XU Hong

Abstract: Due to the specific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eitian* 畏天 (to fear Heaven) becam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morality of emperors, the core of which was to show respect for and awe of Heaven. *Weitian* was used in *zhaoling* 诏令 (imperial edicts) when a new monarch ascended the throne, natural calamities and unusual astronomical phenomena occurred, or ministers presented an imperial honorific title to the monarch. On the one hand, *weitian* demonstrates the awe of Heaven, and on the other, it justifies the legitimacy of kingship based on the mandate of Heaven. It also reflects expectations which scholar-officials at that time had of their rulers in terms of morality. They elucidated *weitian* as a means to regulate emperors' behaviors through sending memorials or writing articles devoted to discussing it. In their point of view, *weitian* is not only something concerning the morality of monarchs, but also of great political significance. It can attest the legitimacy of kingship, as well as educate the common people to cultivate their moral characters, regulate their conducts in society and obey orders from the government, thus stabilizing the reign of emperors.

Key words: Northern Song Dynasty; *weitian*; respect and awe; morality of emperors